



IMI书系
国际货币研究系列丛书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tudies

两次世界大战、五次中东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
硝烟弥漫的背后，无一不能窥见经济大国谋求货币霸权的诉求

II

大国货币

军事篇

戴稳胜 涂永红◎著



科学出版社

大国货币 II

军事篇

戴稳胜 涂永红◎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货币Ⅱ：军事篇 / 戴稳胜, 涂永红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6
(国际货币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41141-9

I. ①大… II. ①戴-②涂- III. ①国际货币制度—研究 IV. ①F8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7010 号

责任编辑: 刘英红 张晓雪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阎磊 /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3/4

字数: 280 00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一

如果从 1566 年欧洲爆发的尼德兰革命开始算起，资本主义面世已经超过了 400 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历经坎坷，先后走过了重商主义、自由经济和帝国主义几个阶段。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广泛、最重要的社会形态之一。尽管有些学者还羞于承认，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资本打造的商品经济几乎承载了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基础。我们也注意到，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时代，它超越了传统定义下国家的限制，正在以政治联盟为基础、以国际经济分工为手段，对整个世界进行重新布局，意图将全世界纳入到适宜资本运行的统一规则之下，以便让资本主义理念深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畅行。这种改变必须高度关注，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为此我们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部分来检视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尽力找寻其中隐含的发展节律，以期对中国的未来做出正确的推断和预测。

一、资本主义缘何兴起

回望历史，当时针指向 18 世纪中叶，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点燃了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火炬，从此人类社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械文明。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倍感振奋的时刻，欧洲大陆上陡然出现了一群燃烧着火焰、喷吐着黑烟的钢铁怪物，巨大的机械很快取代了传统的人力和畜力劳

作，在一片铿锵声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有统计数字表明，从1800年到1825年间，英国的新型蒸汽机数量猛增了50倍，达到15 000台左右，总功率超过375 000马力，动力革命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它使得人类摆脱了自然力的限制，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其后短短的160年间，欧洲16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量增加了60倍，人口增长了4倍，人均产值增加了13倍，而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年工时却从3000小时减至1700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大约20倍。工业革命成倍提高劳动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这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同时也激发了人类的贪婪本性，产生了以攫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商品经济。然而这还不是工业革命的全部成就，机械时代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还加快了人们探索世界的脚步。在蒸汽船发明以前，依靠木船风帆从欧洲到美洲至少需要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2~3个月，不仅花费昂贵而且周期漫长。1819年美国蒸汽船“萨凡纳”号横渡大西洋成功抵达英国的利物浦港，整个航程仅仅用了不到20天。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世界从此变小了。那些曾经在地理大发现中出现的遥远国度如今无不近在眼前，这就仿佛吹响了淘金的号角，贪婪成性的资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它立刻起身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资本主义的理念和生产方式播撒向整个星球。声势浩大的经济全球化就此拉开大幕，开启了资本占领和吞吃世界的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生产力水平成为改变人类世界的关键。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并非生产力本身，而是更高级的文化因素，它依赖于人类对自然认知水平的发展。换句话说，工业文明的到来需要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和鼎力支持。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工业革命的出现既是必然也是偶然。说其必然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绝对的，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积累之中，变革的时刻迟早都会到来；说其偶然是指，1533年

1月英王亨利八世改变婚姻的企图受到天主教会的阻挠，为此他毅然断绝了和罗马教廷的联系。亨利八世此举使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主持下的新教能在英国立足生根。与天主教控制下的旧大陆截然不同，新教的宽容态度不仅使得文艺复兴的火种能在英伦大地上蔓延成势，而且还从北欧地区吸引了大批因尼德兰革命而遭受宗教迫害的手工业者，进一步壮大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时势造英雄，到了17世纪中叶，伦敦已经成为欧洲现代科学人才荟萃的中心。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催生了大量的自由思想，并藉此发展出了诸多学科，形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全新认知。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牛顿的经典力学、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等一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精英，纷纷在英格兰潮湿的土地上绽放出自己绚丽的花朵。与旧大陆那边的自然科学探索者布鲁诺和哥白尼的悲惨命运不同，这些生活在英国的求知者受到了来自新教和英国王室的优待和庇护。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提出，科学家应该把兴趣集中用于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这使得新兴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而自然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又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必备条件，也为新兴的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人类历史拉开新一幕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二、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资本主义自问世以来，以其特有的高效率生产方式迅速征服了整个世界。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已经遍及全球，它跨越了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限制，已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一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及产业模式，这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原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就是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更高级的资本主义形式——全球资

本主义，即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帝国主义。在这种趋势下，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新型的跨国公司而非传统的垄断企业，这种跨国公司基本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股权高度国际化，是由一条完整的生产链所衔接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立生产单位构成的集合体，形成了所谓的“无国界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注册的跨国公司就超过6万家，其附属企业大约30万家，控制了世界生产总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以及技术贸易的60%，专利技术和直接投资的80%也被跨国公司控制。这些跨国公司的运作以世界为舞台，开发、生产、经营与市场调配无不放眼全球。根据投入-产出比较优势，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运作，将人力、生产、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的经营目标则完全服务于母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往往依据内部规则完成，体现了市场和资源两方面的分工协作。这种纽带式的内部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处于不同国家中的子公司间相互联系，彰显了跨国公司生产的整体性和经营的全球性。此外，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和构建子公司，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关的企业文化直接移植到世界任何需要的地方，这种强制趋同的经营方式无疑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进步，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但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那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运作环境。任何经济或贸易上的壁垒、法律的不健全和政治上的不协调，都会阻碍跨国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是国家的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不对外资设置障碍。

三、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发展，想要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就必须加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只有如此，该国才能搭乘国际经济发展的快车，不至于被时代所抛弃。然而对这些踊跃加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国

家而言，它们面对的却是一柄双刃剑。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是在这种分工基础上实现广泛的开放与合作。它一方面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便于经济往来和运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国家的独立性，使政府控制国家的能力受到限制，增大了破坏政权稳定的风险。简而言之，开放的国门固然有利于资本的自由往来，方便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与此同时，资本不受监管的自由流动也使市场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使政府逐渐丧失对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掌控能力，从而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此等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乐见的。不仅如此，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经济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的一个侧面，外来的经济必然会带来外来的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其中一些不相容的部分就会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引起颠覆性的后果。置换、摧毁他国文化，这也许就是某些国家政府积极倡导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别有用心。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西方大国正在试图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开辟的管道，以经济发展为手段和切入口，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灌输给其他国家，动摇和颠覆不同政体的政权，以达到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接管和控制的时候，这种威胁就迫在眉睫了。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政权存在的保障。按照以往的观念，国家安全通常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换言之，一个安全的国家是没有内忧外患的。所谓外患，是指国土安全，即国家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特别是军事侵略的威胁。所谓内忧，是指国内政治、经济不发生重大社会动荡，政权统治稳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强化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发展军事力量，以抗拒外来威胁。然而，物换星移，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由于存在经济的紧密合作与自由流通，经济活动已经没有国界可言，这些不设防的缺口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在势力能

够利用经济交往打开的缺口，把一个国家的外患巧妙地、变本加厉地转化为内忧，进而从内部搞垮一个国家的政权。对此，一国纵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无能为力。当初，西方势力颠覆前苏联的成功运作就是这样的典型范式。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安全已经上升到了与国土安全等同的地位。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核心位置。保障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未雨绸缪、主动布局，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抢占有利位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与对手等同的手段来反制对方。

四、国际货币是大国的利器

当前的国际秩序总体上看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大国的，因为当初的游戏规则出自这些大国之手。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变局中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制定，就能够从战略层面获得主动。当然，想要获得这样的规则制定权，首先需要有资格跻身大国行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大国不是指幅员辽阔或者人口众多，而是指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国家。现实中，能够有资格成为大国者，寥寥无几。有一些国家，如日本，曾绞尽脑汁、试图跻身大国却百般不得要领。因为他们始终不懂，大国应该是综合实力的体现，特别是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那些在某个方面具有突出能力或一技之长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强国，比如日本无疑是经济强国，俄罗斯则是军事强国。按照这一标准划分，历史上获得成功的大国只有英美两家，失败的有前苏联和德意志第三帝国。大国的权威，不仅来自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地位，还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先进性和政治制度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丈量全球经济成果、便利各国经济往来的手段——国际货币。国际货币是大国的利器，使之能攻善守，在捍卫自身利益时挥洒自如，凭空增添了几分胜算。

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已经一蹶不振，美国不仅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还成为当时世界上仅存的军事强国，军事实力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还借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势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经济霸主的地位，使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1965年法国的戴高乐先生曾公开揭露这种行为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正是美元的国际化，使得美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好处不计其数，奠定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超级繁荣，经济和军事的强盛也将美国文化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胜利让美国人自我膨胀，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教育理事会公然宣称：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包括他的所有缺点和弱点，都将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在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近70年过程中，美元、可口可乐、好莱坞和尼米兹级航母的身影遍及全球，成为美国无处不在的烙印。无论是用互联网打造的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中的军事干涉与经济制裁，美国都在努力运用各种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推向全球，希望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固若金汤。然而，历史的车轮有自身的轨迹，不以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全球化大大拆除了国家人为设置的障碍，资本不分国籍、信仰和肤色，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大国与小国一股脑地捆绑在一辆战车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一路向前，发展赋予了许多国家不曾有的话语权。世界是平的，多中心、多元化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形成，美元的霸权地位因此受到了多方挑战。21世纪伊始，欧洲国家创生了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欧元，不仅在经济上使用欧元进行本地区的国际收支，而且在政治上抱团取暖，试图在国际舞台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发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洲声音”。2008年华尔街引爆了祸害全球的金融海啸后，美国的文化、政治制度优势受到普遍质疑，美元的超级国际货币地位更是被公认为是制造这场危机的元凶之一，要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高涨，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废除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一票否决权”、增添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2008年年末，基于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目的，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跨境使用，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的工作悄然兴起。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强大只是大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没有在全球领先的经济总量和份额，一国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然而，一国能否拥有国际货币这一利器，奥秘在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政治、军事和文化是通往大国之路并打造国际货币不可或缺的推手。得之，则事半功倍，如虎添翼；失之，则功亏一篑，美梦难圆。认真盘点国际货币争夺战，分析各大国在打造货币利器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温故而知新，才有可能找准中国崛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康庄大道，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把握自身命运，不至坠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承列
2014年4月22日

序二

国际货币与军事水平——大国的“倚天长剑”与“屠龙宝刀”

不久前那场影响全球各国伤筋动骨的金融危机，为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契机。为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精确定位并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各国在政治经济金融领域展开了全面竞争，尤其是主权货币之间的国际地位竞争日趋激烈。围绕货币展开的国际竞争的结果便是，主权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价值储藏等职能上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际经济中，向来只有少数几种主权货币充当主要国际货币，成为其他国家货币定价的标准及其货币对外标价的“锚货币”，并逐渐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演变成为以少数几种强势货币为核心、纵横交错的新格局。一种主权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表面上看是由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任何一种国际货币的背后其实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这就意味着，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除了继续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外，还必须辅以渐露峥嵘的军事实力。先进的军事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硬保障。

国际货币——大国的“倚天长剑”

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身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就无不以成为大国为自己的梦想。因为不言自明的是，国际秩序的制定中，大国扮演着“做市商”

的角色，而小国是追随者，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当然，此轮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治理结构调整，的确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努力成为大国的机会。然而什么是“大国”？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使得一些有实力的、潜在的大国竞争者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所谓大国，并非仅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应该是那种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虽然历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受制于当时的交通与通信水平，这些国家大多也只是在各自的区域内有着一言九鼎的地位，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唯有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交通、通信技术进步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近现代，各国才有了逐鹿大国的可能。现实生活中，有基础竞争大国资格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有的国家因对大国的理解有偏误，倒在了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途中。例如，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未能紧抓工业革命的时机，失去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已然是明日黄花；曾经横扫欧洲几无敌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因为唯日耳曼人至尊，最终沦为欧洲大陆的区域性强国；曾在军事上唯一能够与美国一决雌雄的苏联，因为政治经济改革失败，轰然倒塌，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国际政治上却只是美国的跟班，在追求世界大国的途中鲜有建树。如果在历史的长河中煮酒论英雄，以对国际事务具备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论，成功地实现大国梦想的国家，只有“日不落帝国”英国以及至今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巅峰的美国。尽管英国和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国际战略有不少差异，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拥有计量全球经济成果、便利各国经济往来的工具——国际货币。拥有国际货币，无疑就拥有了削铁如泥的倚天长剑，使得英国和美国在国际重大事务决策中能够一言九鼎，挥洒自如地捍卫自身利益。

在英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战争和军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588年，英国击败昔日的海上强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兴的海上霸主，走上了扩张海外殖民地的争霸之路。此后，英国又通过战争的方式击败

了最强劲的对手荷兰和法国，确立了海上霸权。尤其是在 1815 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一举击败了法兰西的战争英雄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无与伦比的军事强国。与前几任海上霸主不同，在保持军事霸权的同时，英国人立即开始了英镑的国际化进程。1816 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安排。金本位确保了英镑币值稳定，加上英国凭借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生产的商品于是在世界市场畅通无阻，经济贸易总量迅猛增长，英镑随着英国的商品流向世界各国，很快确立了英镑的霸主地位，国际货币进入了英镑时代。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的海外投资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国际贸易结算中有 90% 使用英镑。

无独有偶，美国的大国崛起途中，军事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70 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英国，但当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较弱，算不上什么世界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饱受战争摧残，经济一蹶不振，英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严重衰退，而国土远离战场的美国却从这场战争中收获颇丰，不仅收获了全球 3/4 的黄金财富，还收获了建立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导权，以及美国梦寐以求的“大馅饼”——国际货币。1944 年，二战中的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败给了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提出的“联合国平准基金计划”，最终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一举奠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享受了无数可见、不可见的益处。1965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先生曾公开抱怨：“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她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正是美元的国际化，奠定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超级繁荣。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国际货币地位相匹配，再强大的军事力量，

再发达的经济程度，在全球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中，最终都会败北。主权货币国际化，既是大国地位竞争的有力武器，又是大国地位的显著标志。

军事水平——大国依仗的屠龙宝刀

国际货币地位如此诱人、如此显赫，令每个国家都怦然心动。然而，从一国的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并非随经济发展而自然加冕，在英镑和美元问鼎国际地位宝座的过程中，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的军事角逐。虽然种族、语言相同的美英之间并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但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英国的经济实力，导致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力量下降，殖民地大量丧失，综合实力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抗衡，这才不得不将国际货币地位拱手相让，成就了美元全球第一大国际货币的地位。

战争对于美元而言恐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美元戴上国际货币体系的王冠之后，又开始对美国的穷兵黩武予以惩罚。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70 年代的越南战争，大量消耗了美国的国力，使其黄金储备日渐减少，不能保证美元与黄金的正常兑换，因而危及美元的币值稳定性。1971 年 8 月 15 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运行了 28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顿时瓦解。美国这种公开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引来国际武装干涉也不足为奇。在美元地位节节败退的时候，美国再次以其军事力量为筹码，1973 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战争中，与中东地区最大的产油国沙特的国王定下盟约，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达成交易的条件便是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交易都要与美元挂钩。意味着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又与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石油挂上了钩，从此，对全球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大宗商品石油成为了美元的货币锚，进而增强了美元作为第一国际货币的超级地位。

第一国际货币的地位，给美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真正实现了“美

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美国人于是可以不计后果地超前消费，寅吃卯粮。正因为如此，对任何可能危及美元霸权地位的行径，美国都会神经过敏，千方百计对挑战者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综合打击。美国的十一个航母编队，则是军事打击手段的真正倚恃。

20 世纪 80 年代，凭借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日本在全球经济领域攻城掠地，美国则积累了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元的国际货币声誉受到不利影响。1985 年 9 月 22 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 G5）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内容是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史称《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走入升值通道，日本政府也企图趁机实现日元国际化。当时，基于强劲的日元升值预期，国际社会对日元的接受程度确实大幅提高，日元结算一度超过全球贸易结算总额的 15%，日元国际化进程似乎是顺风顺水。市场有不可更改的铁血规律，过度升值的日元狠狠打击了日本的实体经济，出口大幅下滑，企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日本经济出现空心化，房地产泡沫巨大。尽管日本政府不断干预外汇市场，希望引导美元升值，以减轻日元升值的巨大伤害。但是日本的手是美国，作为美国的军事附庸，日本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金融方面都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结局可想而知，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元快速国际化不到十年，日本泡沫经济彻底破灭，导致日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启动。当时欧元区人口总量达 3.74 亿，经济产值 8.84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货币，欧元已具备了与美元竞争的经济实力。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欧元要得到各国的认同，要取代美元，需要时间和良好的国际接纳环境。很显然，美国不会给欧元这个强有力的挑战者任何时间与环境。就在欧元诞生两个月后，科索沃战争爆发，科索沃战争制造的恐慌使国

际资本逃离欧洲，令欧元受到了严重打击，欧元兑美元的汇率由战前的 1.07 急跌至战后的 0.82，跌幅达到 30%。一个币值下跌的新货币，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欧元因而一路跌跌撞撞，使用范围基本上固定在欧元区内，在亚洲、美洲和非洲的使用程度很低。究其原因，欧洲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力量仍然不可小觑，足以和美国一比高下，但是其军事并不独立，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北约，这就注定了欧元无法挑战美元，不得不成为美元第一大附庸货币。

2003 年 1 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号召石油交易与美元脱钩，声称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将使用欧元计价结算，并希望各国更多地从波斯湾国家进口石油。如果萨达姆总统果真说到做到，美元挂在石油上的钩子就会松动，美元的币信、作为国际货币的交易功能都会受到打击，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2 个月之后，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为借口发动了海湾战争，尽管至今美国也没有从伊拉克找到任何化学武器，但是伊拉克这个两河文明古国毁于战火，至今未能从政治动荡之中恢复过来，萨达姆本人也身受绞刑并被录相播出。

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人们，霸权货币的更替从来没有温情脉脉的一面，没有独立的强大军事力量做支持去追逐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最终的结局或者沦为霸权货币的傀儡附庸，或者引致军事、经济等各种打击而身死名灭。

路在何方——止戈为武，仗剑扶犁

民主自由是西方国家奉行的普世价值，说的往往不一定是做的，口是心非现象很普遍。

近两百年来，发源于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几乎所有的物质财富，欧洲的社会经济学家们迄今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论证工业化只能发源于欧洲，也只能在欧美模式下才能得以成功。然而，中国这一